

回忆国民党政府 资源委员会

公 誠



中国文史出版社

责任编辑：徐绪堃 韩淑芳

回忆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工商经济组

*

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

(北京太平桥大街23号)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通县燕山印刷厂印刷

三河县南杨庄装订厂装订

*

1988年2月第一版·1988年2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10.25 插页：2 字数：264千字

印数：1—6500册

ISBN 7-5034-0010-2/k·0011

统一书号：11224·256 定价：2.60元

目 录

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始末·····	钱昌照 (1)
我和资源委员会·····	孙越崎 (14)
我所知道的资源委员会·····	吴兆洪 (63)
翁文灏对国营企业的管理办法·····	郑友揆 (142)
资源委员会的技术引进工作·····	恽 震 (148)
解放前中国电力工业的演变·····	陈中熙 (174)
资源委员会的人事管理制度·····	吴福元 (197)
台湾工矿事业考察团纪要·····	曹立瀛 (209)
接收台湾工矿企业以后·····	程麟荪 (223)
抗战胜利后接管东北工矿经过·····	张传洪 (242)
资源委员会移沪迎接解放亲历记·····	李树农 (252)
南京五厂拒迁台湾的斗争·····	沈良骅 王端驥 任国常 (275)
我们坚持留在宁沪·····	谢佩和 (281)
在广州迎接解放的经过·····	冼子恩 (293)
香港起义前后·····	林艾园 (302)
附录	
为中国经济创立崭新时代·····	翁文灏 (308)
资源委员会所属各单位名单·····	(314)

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始末

钱 昌 照

一 资源委员会前身——国防 设计委员会的筹办

1931年冬季，九一八事变以后，那时候我在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担任常务次长兼国民政府秘书，每天上午在教育部工作，下午在蒋介石住的地方和他一起见客。有一天晚上，我向蒋介石建议筹办一个国防设计机构。我对他说：“国防设计应该是广义的，其中包括军事、国际关系、教育文化、财政经济、原料及制造、交通运输、土地及粮食和专门人才的调查等部门。”他问我哪些人可以担任这些工作，要我拟一张名单。一两个星期以后，我把名单拟好交给他。名单上没有宋子文、孔祥熙和陈果夫、陈立夫的人，也没有当时在国民党政府负实际责任的人。军事方面有陈仪、洪中、杨继曾等，国际关系方面有王世杰、周览、徐淑希等，教育文化方面有胡适、杨振声、张其昀等，财政经济方面有吴鼎昌、张嘉璈、徐新六、陶孟和、杨端六、刘大钧等，原料及制造方面有丁文江、翁文灏、顾振、范锐、吴蕴初、刘鸿生等，交通运输方面有黄伯樵、沈怡、陈伯庄等，土地及粮食方面有万国鼎、沈宗瀚、赵联芳等，一起有四五十人。蒋介石同意这张名单，仅在军事方面增加林蔚。当时商定由我先和那些人交换意见，再约其中的一部分人和蒋介石见面，或者为他讲学。就我记忆所及，1932年春、夏、秋三季在南京、牯岭、武汉由我介绍和

蒋介石见面或者为他讲学的有王世杰、周览、徐淑希、胡适、张其昀、吴鼎昌、徐新六、杨端六、丁文江、翁文灏、顾振、范锐、吴蕴初、陈伯庄、万国鼎等二三十人。

1932年10月初，蒋介石决定组织国防设计委员会，对外保密。为便于工作起见，隶属国民党政府参谋本部。蒋介石自任委员长，要我担任副秘书长负实际责任，要陈其采担任秘书长。陈其采是二陈的叔父，又是百分之百的官僚，我不赞成。他问我什么人比较适宜，我提到翁文灏，他同意了。国防设计委员会设委员四五十人，十之八九是在原来名单上的。另又函聘专门委员近200人，都是当时社会上知名人士。

此刻谈一谈我建议筹办国防设计委员会的动机。分析起来，可分三点：（一）我是痛恨日本帝国主义的，同时我认为总有一天日本帝国主义会大举侵略中国；（二）我一向高唱中国工业化，对蒋介石存有幻想，认为蒋介石大权在握，如果他能支持工业建设，事半功倍；（三）我在政治上是有野心的，很想拉拢一大批银行家、实业家、名流、学者作为政治资本，在蒋介石旁边独树一帜。至于蒋介石所以接受我的建议，分析起来，也有三点：（一）他利用我去拉拢那些银行家、实业家、名流、学者作为招牌以取信人民，所费有限，收效可能很大；（二）他利用我们这班人去勾结德、英、美三个帝国主义，因为那时候帝国主义者对国民党政府的官员颇为不满；（三）他利用我们这班人去牵制国民党政府里的其他势力，包括宋、孔、二陈在内，这是蒋介石经常玩的一套手段。

二 国防设计委员会的调查研究工作

1932年11月1日国防设计委员会正式成立，工作分为八个部门。

（一）军事方面：调查研究日本和德国的军事情况，同时计

划训练新兵，规定每个标准师的员额装备。

（二）国际关系方面：分析国际形势，特别注意日本的外交动态，同时研究东北、西北、西南、蒙古、新疆、西藏等边疆问题。

（三）教育文化方面：编制国语、公民、历史、地理中小学教科书，同时研究世界各国训练青年的方式方法。

（四）财政经济方面：研究中央和地方财政制度，试拟币制改革方案，调查国民收入。

（五）原料及制造方面：关于地质调查，由国防设计委员会担负经费，实际工作由地质调查所负责；关于矿产调查、水力调查和森林调查，派有专人负责；关于工业调查，由国防设计委员会担负经费，实际工作由中国经济统计研究所负责。

（六）交通运输方面：铁路、公路、航运、电信的调查研究，均派有专人负责。铁路着重在各路设备和军事运输能力；公路着重在军用公路的标准和汽车修配厂的能力；航运着重在港口设备和航道安全；电信着重在器材制造和器材储存。

（七）土地及粮食方面：研究可耕地面积和土地利用，同时进行全国范围内粮食运销调查，并在各大城市建立定期报告制度。

（八）专门人才调查方面：普遍印发调查表，分析专门人才是否用其所学，同时研究一旦中日战争起来应该如何分配任务。

自国防设计委员会正式成立之日起，有一年半时间，进行以上八项工作，每项工作都写有比较详细的报告。

三 抗战以前资源委员会的工作

1935年4月国防设计委员会改隶军事委员会，易名资源委员会。根据组织条例，职掌应为：（一）关于资源的调查研究，（二）关于资源的开发，（三）关于资源的动员。由于职掌变更，工作也有所调整。原来的军事、国际关系、教育文化三个部门分别结束。从那时候起调查研究阶段逐步过渡到重工业建设阶段。

1935年拟具了一个三年计划，其内容如下：甲、统制钨锑，同时建设钨铁厂，年产钨铁2000吨。乙、建设湘潭和马鞍山炼钢厂，年产30万吨。丙、开发宁乡和茶陵铁矿，年产30万吨。丁、开发大冶、阳新和彭县铜矿，同时建设炼铜厂，年产3600吨。戊、开发水口山和贵县铅锌矿，年产5000吨。己、开发高坑、天河、谭家山和禹县煤矿，年产150万吨。庚、建设煤炼油厂，同时开发延长、巴县和达县石油矿，年产2500万加仑。辛、建设氮气厂，年产硫酸铵5万吨，同时制造硫酸、硝酸。壬、建设飞机发动机厂、原动力机厂和工具机厂。癸、建设电机厂、电线厂、电话厂和电子管厂。

那时候国营私营之争相当剧烈，资源委员会规定了以下几项原则：甲、为国防所必需，应该由国家特别经营的事业，由国家经营。乙、在国防上或经济上有统筹之必要的事业，由国家经营。丙、特种产品在国际上近乎独占，可以左右国际市场的事业，由国家经营。丁、规模宏大，需要特殊设备和大批人才，私人没有力量办，或虽有力量办而由于经济上无把握不愿意去办的事业，由国家经营。戊、精密制品为自给上所必需，技术甚感困难，人才甚感缺乏，目前无利可图的事业，由国家经营提倡。己、私人经营的事业，出品数量不够供应国内需要，为使供需适应，国家可同时经营。庚、私人愿意办而力有不及的事业，经国家审查后，酌量予以物质上的协助。辛、所有私人经营的事业，国家应该予以政治上和精神上的协助。

1936年资源委员会开始工业建设。经过一年多时间，成立厂矿单位21个，其中包括煤矿、石油矿、铁矿、铜矿、铅锌矿、锡矿、金矿、炼钢厂、炼铜厂、钨铁厂、机器制造厂、电工器材厂、无线电机制造厂、电瓷制造厂、水力发电厂等。当时考虑到有关国防，这些厂矿分布在湖南、湖北、江西、云南、四川、青海等省，沿海地区一个也没有。除兴办厂矿外，又复着手钨锑管理。钨业管理处设在南昌，锑业管理处设在长沙。两个管理

处的任务一方面为管理矿品的产运销，一方面为改进产炼方法。

四 抗战时期资源委员会的工作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开始了。由于军事关系，资源委员会各项事业当然受有影响。接近战区的厂矿，迁移的迁移，停办的停办，损失相当大。临时工作有汽油管制、煤炭管制、沿海地区购运国防物资等等。此外还协助沿海地区私营厂矿内迁。1937年8月由资源委员会主持，会同财政部、军政部、实业部组织工厂迁移监督委员会，派遣大批人员前往上海、苏州、无锡、常州、青岛、天津等地进行工作。仅仅上海一隅，迁出私营工厂就有146家，技术工人2500多名，器材14600多吨。职工在枪林弹雨之中，奋勇拆迁，充分发扬了爱国精神。

1938年3月，资源委员会改隶国民党政府经济部，由翁文灏部长兼任主任委员，我担任副主任委员。根据组织条例，职掌应为：（一）创办和管理经营基本工业；（二）开发和管理经营重要矿业；（三）创办和管理经营电力事业。此次改组，有一比较重要的变更，即原由建设委员会负责办理的电力事业，改归资源委员会负责办理。

抗战八年，资源委员会各项事业，由于设备简陋，原材料缺乏，交通阻滞，单位虽多，规模不大。分布在江西、湖南、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四川、西康、陕西、甘肃、青海、新疆等省。抗战胜利前夕，厂矿单位共有121个，其中包括火力发电厂和水力发电厂26个，煤矿19个，石油矿2个，铁矿和铜铅锌矿4个，钨、锑、锡、汞矿10个，金矿2个，冶炼工业9个，机械工业7个，电器工业5个，化学工业37个。经营方式分为三类：一类是独办；一类是和其他方面合办由资源委员会主持；一类是和其他方面合办由其他方面主持。121个单位中，85%是独办的。除厂矿外，出口矿产的管理机构共有4个，负责产购运销和对外

易货还债。所谓出口矿产指的是钨、锑、锡、汞、铋、钼。抗战时期有六批外债用矿产偿还，三批是向苏联借的，三批是向美国借的。向苏联借的：第一批1938年3月为5000万美元，第二批同年7月也是5000万美元，第三批1939年6月为15000万美元，半数用矿产偿还。向美国借的：第一批1940年4月为2000万美元，第二批同年10月为2500万美元，第三批1941年2月为5000万美元，全数用矿产偿还。抗战时期，资源委员会运交苏联的有钨砂31177吨，锑10892吨，锡13162吨，汞560吨，铋600吨，铋18吨。运交美国的有钨砂16814吨，锑2083吨，锡10708吨。当时产购方面，问题不大，困难在于运输，特别是滇缅路封闭、海口断绝以后，所有飞机、轮船、汽车、骆驼、羊皮筏子等交通工具全部用上，勉强维持信用。

五 抗战胜利以后资源委员会的工作

1945年8月，日本投降。1946年3月，资源委员会改隶国民政府行政院，由我担任委员长，孙越崎担任副委员长。职掌略有变更，除经营管理重工业外，加上糖、纸两业。1946年5月，宋子文三次要我把纺织业全部接管过来，我都拒绝了。

抗战胜利以后，资源委员会工作分为四个部门：

（一）关于后方战时事业的调整。调整原则为：甲、战时需要、战后不再需要的停办；乙、事业规模不大，产品可供当地之用的，尽可能让给地方政府或私人经营；丙、需要不大，但事业本身有保留价值的，酌量紧缩，或者暂时停办，相机恢复；丁、对国计民生有重大关系的，巩固扩建。经过调整，停办的有22个单位，让给地方政府或私人经营的有13个单位，酌量紧缩或暂时停办、相机恢复的有58个单位，余者巩固扩建。

（二）关于收复区敌伪事业的接管。接管原则为：甲、性质属于重工业的，此外加上糖、纸两业；乙、为便于经营管理，尽可

能化零为整；丙、尽可能采用公司组织，力求企业化；丁、迅速恢复生产。1946年2月起，先后在华中、华北、台湾、东北、华南、海南岛进行接管，年底告一段落。接管过来的敌伪事业，在大陆上的，日本军队撤退时进行破坏，国民党军队收复时又复任意摧残；在台湾的，战时好几次遭到轰炸。因此，在资源委员会接管的时候，有的完全停顿，有的勉强开工，生产一落千丈。

（三）关于日本赔偿。我国战时损失太极了，抗战胜利以后，按照波茨坦宣言，不向日本要求现款赔偿，着重在拆迁日本国内工业设备。资源委员会派了不少专家前往日本，参加此项工作。在重工业范围内，资源委员会提出的初步要求是：火力发电设备120万千瓦；年产240万吨的钢铁冶炼设备；年产锅炉25万马力的设备；年产柴油机10万马力的设备；年产滚珠轴承300万件的设备；年产50万吨的造船设备；年产机车600辆、客车800辆、货车6000辆的设备；年产卡车25000辆、小汽车5000辆的设备；日产亚摩尼亚600吨、硝酸200吨、纯碱600吨、烧碱210吨、氯液180吨的设备；此外尚有工具、工具机、电器制造的设备等。这一初步要求十分合理，而美国帝国主义置盟国利益于不顾，一心扶植战败的日本作为它的远东军事基地，屡次派遣调查团提出减少赔偿的主张，最后竟然宣布停止拆迁，赔偿问题，完全落空。资源委员会在赔偿方面，只收到1559箱、重约4500吨的器材。

（四）关于长期计划。1943年冬季，资源委员会就着手进行长期计划。1945年和中央设计局合作草拟了重工业五年计划，分为六大部门：甲、动力方面，规定战后第五年火力发电容量达到312万千瓦，水力发电容量153万千瓦，职工共32000人。乙、矿冶方面，战后第五年产量为：煤炭1亿吨、石油220万吨、钢铁300万吨、铜5000吨、铅15000吨、锌6500吨、铝65000吨、钨砂15000吨、锑15000吨、锡14000吨，职工共507000人。丙、机械工业方面，战后第五年产量为：锅炉30万热面平方公尺、蒸汽机15万马力、内燃机22万马力、金属切削机床1万部、手提工具机4万部、工

具量具560万件、滚珠轴承200万件，职工共52000人。丁、运输工具方面，战后第五年产量为：机车100辆、客货车2600辆、柴油汽车3万辆、汽油汽车3万辆、飞机700架、飞机发动机3000具、轮船9万吨，职工共115000人。戊、电器工业方面，战后第五年产量为：汽轮发电机35万千瓦、水轮发电机30万千瓦、电动机130万马力、变压器190万千伏安、电话机17万具、普通电报机300具、无线电发报机500具、广播收音机36万具、电线2万吨、电子管200万只，职工共10万人。己、化学工业方面，战后第五年产量为：硫酸45万吨、硫酸銍含氮10万吨、磷肥22万吨、纯碱25万吨、烧碱13万吨、水泥1270万桶，职工共6万人。这个计划，由于蒋介石发动内战，一切都落空了。实际上在半殖民地半封建或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国家里，计划经济的施行是绝对不可能的。

1947年4月，我离开了国民党政府。当时资源委员会的事业分为十个部门：属于重工业的有电力、煤炭、石油、金属矿、钢铁、机械工业、电器工业、化学工业，属于轻工业的有糖、纸。十个部门共有111个单位。1947年，资源委员会事业在全国生产中所占比重很大：电力在50%以上，煤炭32.5%，石油100%，钢铁80%，金属矿如钨、锑、锡极大多数由资源委员会控制，其他如机械工业、电器工业、化学工业和糖、纸所占百分数都很大，职员32800多名，40%为技术人员，工人226900多名，40%以上为技术工人。从1947年4月到解放，变动不大。各地陆续解放，由于事前有些布置，人离开的不多，机器没有搬走，也没有破坏，全部由军管会接收了。

六 工作中的困难

蒋介石所要建设的是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同时由于他蓄意发动全国范围的內战，对于工业并不重视，资源委员会在工作过程中，困难是很多的。先就经

费来说，从1936年有正式预算起，到1947年我离开国民党政府，12年间，每年预算平均只占国家总预算1%左右。此外国民党政府拨付一些国外贷款，12年合计只有615000英镑、1500万美元。其他全靠国内银行贷款弥补。各项事业的经营方针为：一方面要求收支自给，一方面要求所有产品，定价公允，免得影响市场。年度终了，如有盈余，悉数上缴。一般工作上的困难那就更多了。举两个例子，可概其余。

（一）1940年我和孙越崎、霍宝树等到了玉门油矿，我要他们根据实际情况，拟一初步开发计划。他们拟好了，但是很颓丧地说：“需要12000万国币，500万美元，恐怕政府不答应。”我说：“此事由我负责。”回到重庆，蒋介石同意了，孔祥熙起来反对，叫蒋廷黻在国民党政府行政院会议上，提出招商承办的主张，并且通过了决议，这等于说不办。我在国防最高委员会国防工业委员会会议上又把计划提出来，气愤地说：“中国如果是个上轨道的国家，抗战以前，这样的矿早就应该开发了。时至今日，再不开发，太不象样子。”当时除财政部代表外，大家都赞成我的意见，结果取消了行政院的决议。就由于这一纠葛，耽误了两个半月。接着珍珠港事件爆发，1/3的机器运到仰光被炸，其余的在旧金山运不出来。要不是孔祥熙从中作梗，全部机器可以运到玉门，产油炼油就能顺利进行。抗战期间在重庆许多人批评玉门油矿，却无人追究谁误了事。

（二）扬子江三峡水利工程计划是一个多元计划，除发电1056万千瓦外，兼顾航运、防洪、灌溉、都市给水、水产等利益。1944年5月，我电邀美国垦务局设计总工程师萨凡奇来华，先在川西都江堰、大渡河以及长寿龙溪河勘察水力，9月又到三峡勘察。1945年5月，开始筹备工作，由资源委员会主持，会同水利委员会、扬子江水利委员会、中央水利实验处、中央农业试验所、交通部航政司、中央地质调查所等机关组织扬子江三峡计划技术研究委员会，我兼任主任委员。会议商定：实地勘察由资源

委员会全国水力发电工程总处负责，工程设计由美国垦务局负责。从此各项工作如坝址钻探、水库航空测量、地质调查、水文调查、经济调查等均陆续进行。到了1947年4月，各种拦河坝、电厂、船闸的比较布置，各部门工程的比较设计，已经作出；洪水量、水库容量、航道、深度等也有了初步决定。估计全部工程的主要设计图样和施工规范可于1948年年底完成。而在1947年5月初，在我离开国民党政府以后不到两星期，行政院决议停办。现在分析，幸而这一计划没有进行到底，否则美国帝国主义又可以利用世界上最大水力资源，大肆掠夺。我所以在这里附带提一提，为了说明在反动政府里，根本无建设之可言。

七 资源委员会的本质分析

这里就资源委员会和四大家族的关系以及蒋介石利用资源委员会拉拢地方封建势力、勾结帝国主义三个方面简要地说一说。

（一）资源委员会和四大家族的关系。1936年7月以前，资源委员会经费由蒋介石核定，在军事委员会特别费内开支。1936年7月起，才由财政部拨付。关于资源委员会内部工作，蒋介石随时可以来个手令，要做这样，要做那样，不要做这样，不要做那样，整个机关在他控制之下。资源委员会和宋子文的关系是从1935年币制改革的时候开始的。平时我和他来往相当多，也无非互相利用。抗战胜利前夕同往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日本投降后又同往美国洽商借款，这些待下文详述。至于资源委员会和孔祥熙、二陈的关系乃是始终对立的。孔祥熙想抓钨、锑，没有达到目的，怀恨在心。抗战初期，有一段时间，资源委员会经费一个钱也领不到，这完全是孔祥熙在作祟，后来由于资源委员会对苏联、美国易货偿债，没有钱是不行的，孔祥熙才不得不发。二陈常想在资源委员会各项事业内设立国民党党部，我总是拒绝。直到抗战末期，才在一些厂矿设立党部。他们又常想

通过蒋介石命令式地派人参加资源委员会，我也总是拒绝。记得1933年蒋介石从南昌三次来电，介绍一个和二陈有密切关系的靳某，我三次去电拒绝。抗战胜利前夕，二陈想尽办法介绍中统头目之一叶秀峰参加资源委员会，始终没有达到目的。抗战胜利以后，他们又利用曾养甫在华北一带组织公司，侵占敌伪事业，资源委员会在业务范围内绝不让步，当时关系相当紧张。进一步分析，资源委员会所以能够和孔、陈对抗，一则由于蒋介石在经济方面往往利用资源委员会牵制孔、陈，二则由于宋子文和孔、陈一向不合，勾心斗角，每当资源委员会和孔、陈发生争执的时候，他总是支持资源委员会的。

（二）蒋介石利用资源委员会拉拢地方封建势力。蒋介石利用资源委员会在各省开发资源，兴办厂矿，以达在经济方面拉拢地方封建势力的目的。即如1936年在湖南成立锑业管理处，乃是和何键商定的；同年在江西成立钨业管理处，乃是和熊式辉商定的，抗战前后、抗战时期，在广东、广西、云南、四川、西康、陕西、甘肃、青海、新疆等省兴办厂矿，乃是和李汉魂、黄旭初、龙云、邓锡侯、刘文辉、熊斌、谷正伦、马步芳、盛世才等商定的。钨锑管理，会省合办，资源委员会提供资金，盈余会省各半，厂矿有的由会独办，有的会省合办，合办的由资源委员会提供资金，盈余会省各半。各地方封建势力无心建设，有人在他们控制的区域内办些厂矿，点缀门面，又不要他们出钱，因之很少反对。况且合办的厂矿还可以分些盈余，何乐不为。有些地方封建势力也就借此敷衍蒋介石，一举数得。

（三）蒋介石利用资源委员会勾结帝国主义。举三个例子：

甲、前面我曾经说过，资源委员会前身国防设计委员会正式成立以后，着手试拟币制改革方案。当时英美帝国主义明争暗斗，都想操纵中国金融。1930年美国帝国主义派凯末尔来华，建议改用金本位制，没有成功。1935年夏季英国帝国主义派李滋罗斯、霍尔柏契、罗杰士三人来华，替国民党政府筹划币制改革。

蒋介石叫宋子文主持其事，宋子文邀我参加，我又介绍徐新六、顾翊群二人帮同工作。在筹划期间，连孔祥熙都没有能过问。筹划了三四个月，一切就绪，11月4日正式发表币制改革方案，规定法币1元折合英镑12.77便士。这是一种纯粹殖民地性质的外汇本位制，通过外汇关系，中国币制成为英镑集团的附庸，后来又成为金元集团的仆从。同时蒋介石也就利用法币政策，垄断金融，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银行完全成为蒋介石的囊中物，反人民的内战经费，随时可以乞灵于钞票印刷机，导致通货膨胀，为人民带来灾难。

乙、1936年蒋介石为了勾结希特勒，派资源委员会委员顾振、吴蕴初，专家王守竞、金开英到纳粹德国去借款，结果借到了1亿金马克，一部分在德国买军火，一部分在德国买机器。纳粹德国组织了一个公司叫做“合步楼”，在中国市场争购战略物资如钨、锑、锡等为希特勒备战之用。

丙、1945年8月在莫斯科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后，我和宋子文同机飞往美国，洽商借款，原则上商定了20亿美元，11亿用在工业方面，9亿用在交通主要是铁路方面。第一年拨付56000万。接着又到加拿大，原则上商定了2亿美元借款，也用在工业交通方面。第一年拨付6000万。这两笔借款国民党政府实际上收到的只有美国6000万、加拿大6000万，余者由于蒋介石发动全国范围的内战，美、加认为借款归还没有保障，停止拨付。现在分析，幸而借款没有全部实现，要不然我国工业、交通建设，用的是美国帝国主义的钱，技术又为美国帝国主义所控制，为害之大，不堪设想。这里我想讲一讲抗战前后，资源委员会和德、英、美三国垄断资本集团的技术合作。抗战以前，炼钢厂、钨铁厂、煤炼油厂、氮气厂、电话厂和德国的大公司签订技术合作合同，电线厂和英国的大公司签订技术合作合同，机器厂、电子管厂和美国的大公司签订技术合作合同。抗战胜利，在和美国商定借款以后，又和美国的18家大公司签订技术合作合同，范

围很广，包括电力、煤炭、石油、铜、铝、金、钨、锑、锡、钢铁、机械、电机、电话、化肥、制碱、水泥、糖、纸等。这18家公司都曾派人来华，勘察设计。

我和资源委员会

孙越崎

一 参加国防设计委员会

我在北洋大学矿科毕业后，1924年初到吉林省穆棱煤矿，在那里工作了五年八个月。1927年北京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来矿调查时，对我的工作干劲和成绩很赞赏。1929年夏他推荐我任河北井陘煤矿总工程师，我因正拟出国去美深造，婉辞未应。

1929年秋我去美国史丹福大学矿科研究生院学习。1931年9月到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学习半年，实际上全部时间花在参观东部煤矿。1932年3月去英、法、德三国的煤矿参观实习了半年，同年8月到苏联莫斯科参观了两星期，然后经西伯利亚铁路回国。当时我家在哈尔滨，出国三年，东北已被日军占领。我在家住了不到一个月，就经大连乘轮船转车到了北平。

1932年11月底，我经翁文灏介绍参加了国防设计委员会，担任专员。1933年国防设计委员会派我到陕北的延长、延川、延安一带调查油矿资源，准备进行钻探。我的绍兴同乡、也是我在上海复旦公学时的国文老师邵力子，当时任陕西省政府主席。我致电邵先生请予多方协助。那时陇海铁路只通车到潼关，到潼关后由县长张丰胃招待我，乘邵先生派来的汽车去西安。与我同行的有国防设计委员会的张心田。我们到西安后，邵先生又派了陕西省建设厅技正、北京大学矿科毕业的赵国宾陪同前往陕北。那时西安到延长不通公路，我们都是骑马去的。沿途经省政府通知，有